

专题

← (上接5版)

5. Benjamin Kidd 原著,角田柳作译:《社会之进化》,东京:开拓社,1899年,第208-209页(第十一段,引作“格得社会之进化”);

6. 武岛又次郎:《修辞学》,东京:博文馆,1898年,第31、35-38页(第十四段);

7. Matthew Arnold. *Essays in Criticism*. London and Cambridge: MacMillan, 1865, [?](第十四段,引作“阿诺路得评判论”,转引自[6]武岛又次郎书第32页)。

其中虽有 Collier 和 Arnold 两种英文书,实皆转引自日文著作。此外,第四段末还有介绍印度名词“性”变化的数句,并未标明出处;从“独拉维达”(即Dravidian,通译达罗毗荼)等音译语看,当仍是来自日文。此次滞日期间,章氏曾为广智书局“删润译稿”,1902年9月有署名“章炳麟译”的岸本能武太《社会学》一书出版。但对他的日文能力也不可作过高估计,因其引用多为意译或节译,且无不误解之处。

章太炎中年以后,对日感情既发生变化,对日本学术评价尤低,故往往抹去早期著作中援用日文材料的痕迹。加之他素来以“国粹”自任,更要强调中国语文与历史的独异性,尝以为:“在心在物之学,体自周圆,无间方国;独于言文、历史,其体自方,自以己国为典型,而不能取之域外”(《自述学术次第》),二者为“中国独有之学,非共同之学”(《章太炎先生答问》)。然而,若回到《文学说例》撰著的现场,章太炎以西学为导引,重新厘定中国文字、文学价值的倾向却相当明显。他甚至以印度名词“性”之多变(高性劣性、生物性无生物性、阴性阳性中性等变化)反衬中国语词“纯简”(第四段),以日文助词“コト”附会先秦典籍中训为“事”的采、载、言等虚字(第五段)。一则曰“厥在中夏,宁独有异”(第四段),再则曰“微之禹域,秩序亦同”(第九段),三则曰“人情所必至,初无间于东西”(第十二段),似乎并不视之为“中国独有之学”。此类比较语言学或比较文学方法的浅尝,在章氏对姊崎正治、涩江保等人著作的创造性援引中,体现得最为明显。

近代日本的宗教学者姊崎正治(1873—1949)对章氏学术趋向影响甚巨。就此,中日两国学者已颇有讨论(小林武《章太炎と明治思潮:もう一つの近代》、彭春凌《章太炎对姊崎正治宗教学思想的

扬弃》)。姊崎正治1896年毕业于帝国大学哲学科,先后在净土宗高等学院、东京专门学校、帝国大学等处讲授“比较宗教学”。章太炎在《文学说例》和《梵书重订本》中屡屡征引的《宗教学概论》,就是来自以上诸校的讲义录。

在《文学说例》紧接叙文的第二段,章氏将“六书”分为两组:1)象形、形声、指事、会意“皆以组成本义”;2)假借即引伸,“不得不假借以为表象”。(按此即戴震所谓“四体二用”,但未涉及转注。又此时章太炎尚认为假借“与夫意义绝异而徒以同声通用者,其趣殊矣”,与后来所说假借义不同。)所谓“表象”,引自姊崎正治的宗教学病理说:

姊崎正治曰:……凡表象主义之病质,不独宗教为然,即人间之精神现象社会现象,其生命必与病质具存。马科斯·牟拉以神话为言语之疾病肿物。虽然,言语本不能与外物吻合,则必不得不有所表象。手稿本此段开头原作“姊崎正治述独逸人语曰”。“独逸人”即下文提到的“马科斯·牟拉”。身为比较宗教学、比较语言学以及东方学、神话学的多栖学者,出生于德国的牛津大学教授Friedrich Max Müller(1823—1900)在明治中后期的日本学界享有盛名。据说姊崎正治走上宗教研究道路,也曾受其著作导引(《嘲风会》《姊崎正治先生书志》)。所引“神话为言语之疾病肿物”一语的原话是:“Mythology, which was the bane of the ancient world, is in truth a disease of language.”(氏著 *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*. New York: Charles Scribner, 1861, p.2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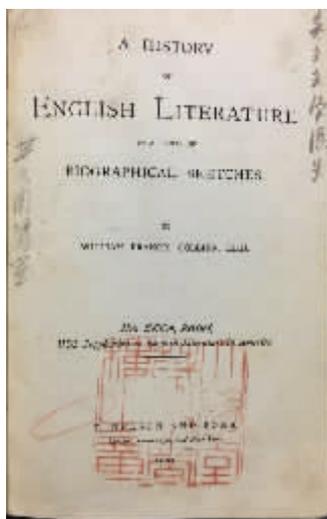
章太炎援引姊崎书中所举语言“表象”之例:“雨降”“风吹”是以人类动作比拟自然现象,“思想之深远”“度量之宽宏”等说法,则是以有形空间衡量无形精神。由此类推,则《说文》之假借亦是“表象”的体现:“来”字“象芒束之形”,本义为麦子,却因周颂“貽我来牟”之瑞从天降来,引伸为“行来”的“来”;“孔”字“从乙从子”,亦缘玄鸟(乙)至而得子的传说,而有“嘉美”之义。当代语言学家断言人类思维基于隐喻,正是隐喻在已知概念和未知概念、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之间搭建起桥梁,构成语言系统(参看乔治·莱考夫、马克·约翰逊著、何文忠译: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》)。但章太炎对于语言文字的繁衍,却偏向更为客观主义的立场:语言发端时,固然难免“表象”之病;但若在文字孳乳、另造“正字”之后,仍然沉溺于

“表象”,“习用古文而愈更新体”,则非章氏所能承认。他要恢复的是“正字”而非“古文”。“古文”有出自“表象”者,而“正字”的孳乳,也有可能后于“古文”。于是,“表象主义”为宗教学病理之说,意外地为训诂正名提供了外来的学理支撑。《文学说例》推崇“故训求是之文”(第三段),同时也强调剖析名理,引入名家之说(第四段),旨在使文字时时“与外物吻合”,避免表象之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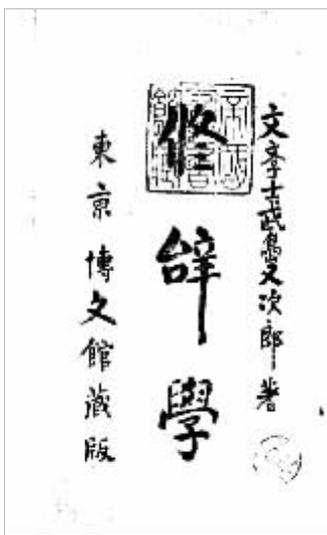
《文学说例》另一个重要的外来凭借是涩江保的《希腊罗马文学史》。与正牌帝国大学毕业并随后留学英、德的姊崎正治恰成对照,自号“幸福散史”的涩江保(1857—1930)虽出身于医学世家,却主要活跃在民间舆论界,以面向市民读者的博文馆为基地,编译了横跨数学、哲学、天文学、社会学、伦理学、战争史、文学史乃至手工、体操、为人处世等广阔领域的大量通俗书籍,还写过多部冒险小说,几乎是一个万金油式的作家。1890年前后,博文馆主人大桥佐平有意出版日本文学史,命涩江保编纂“泰西文学史”作为配合。收入该馆“通俗教育全书”第56编的《希腊罗马文学史》,便是其中之一。

今天来看,涩江氏此书与其说是“文学史”,不如说只是一份关于欧洲古典文学的知识大纲。但他在该书绪言中,介绍“文学史之必要”“文学之定义”“其起源发达”“其种类”等内容,摘译了古典时代以来西洋学者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。《文学说例》第九段以下对该书的大段引用,使章太炎基于训诂正名的“文学”论得以与西方古今的各种文学概念对接。更为重要的是,1937年《制言》第34期登出潘承弼等辑《太炎先生著述目录后编》,“专著”一栏即有未刊的《希腊罗马文学史》一种(按语曰“此书译自日文,与前书同归长沙章氏”)。可知章太炎曾经翻译(或至少润色)涩江氏此作的全书,故对其书绪言中所译介的西洋文学定义、文字起源,以及文学因缘书写材料而得名诸说,即便未见直接征引,也有可能了然于心。从《文学说例》开始,章氏文论的重心渐由“文例”转向“文学”,当与涩江氏此部“文学史”的刺激不无关系。

回到《文学说例》,章太炎在第九段首先援引了涩江氏关于希腊文类“自然发达”的记述。所谓“自然发达”,即未受外力影响,故其文类发生如四季迭代,体现了自然秩序:先有韵文(verse)再有散文(prose),韵



章太炎所引“穀利亚英国文学史”扉页,清末京师大学堂藏1907年重印本。



武岛又次郎《修辞学》封面

文按史诗(epic poetry)、乐诗(lyric poetry)、戏曲诗(dramatic poetry)顺序发生;史诗中又分大史诗(grand epic)、正史诗(historical poem, 即有韵历史metrical history)等八类。散文则先后出现历史文(historical prose)、哲学文(philosophical prose)、演说文(oratorical prose)三种。章太炎后来称颂各国学术“能自恢曠”者,惟有中国、印度、希腊(《国故论衡·原学》);中国既然与希腊一样不受外力薰染,故其文学理应按同样的顺序“自然发达”。大概先有口传之史诗,降而此体“废于史官,而业存于瞽瞍”,遂为《诗》之二《雅》。《书》分为二种:誓诰直录其语,为口说之祖;帝典则为“有韵之史”,正可类比于希腊的“正史诗”。逮至《春秋》以后,史书皆不用韵,是则散文之“历史文”先起;继而有管子(百官记数,源于周官)、老庄(立均出度,分属韵文)、孔墨(六国诸子所出)三种“哲学文”;至战国,纵横家起于行人口说,名家确立“演说元则”,是为“演说文”。按照章氏的描述,先秦时代经子文辞相继繁盛,确与古希腊文类发达的顺序若合符契。

在以上中西著述发端的对

比中,章太炎自然会把经书(史诗及乐诗)、子书(哲学文、演说文)、史书(历史文)包纳在“文学史”范围之内。而在回溯战国“演说文”兴起之际,结合章学诚的《诗教》论,太炎又发现了“言语文学,厥科本异”的源头,继而铺陈“口说与文笔大殊”的理念。在他看来,六国纵横家言、宋儒语录,以及晚清流行的演说策论(源自“袁宋策锋”),都属于同一系统,即“务动听闻”的“口说”,故与“务合体要”且“关于故训”的“文辞”不同科。《文学说例》对“文辞”、“文笔”等概念名义还没有严格分梳,但章氏文学论中“言语文字,功能不齐”的基本立场已然形成。

《文学说例》颇能容纳骈文与《选》学:既言“《文选》不录口说(按:口说指纵横家辨说,《文选序》所谓‘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’者),此后人所宜法”(第十段);又以骈文“体若骈枝,语反简赅”,远胜苏轼、陈亮之辞费;进而称道阮元推崇骈体,“上溯《文言》,信哉其见之卓也”(第十二段)。这些论调,与四年后以阮元、刘师培一派“文言说”为潜在论敌的《文学论略》相比,何其相反乃尔!其实章氏此时对骈体的宽容,多少也受到“希腊文辞”的引导。章氏所引涩江保书中提及古希腊人也追求“对称恰好”,不仅作文章讲究对偶,神庙建筑、装饰、雕像等亦莫不如是。章太炎引之,以为爱好骈偶“固人情所必至,初无间于东西”。其议论之通达,较之日后刘师培在《中古文学史讲义》中贸然声称骈文律诗“乃禹域所独然,殊方所未有”,自有高下之别。

《文学说例》可能正好处在章太炎学术尚未定型的一个窗口期。然而,如果就此认为该文对外来资源毫无别择,照单全收,甚至以西例中,则亦不符合事实。比如他对晚清学界、教育界颇为流行的“修辞学”“文法学”诸说就不无警惕。

《文学说例》第十四段引武岛又次郎《修辞学》:“言语三种,适于文辞:曰现在使用法、国民使用法、著名使用法,是为善良用法。反之,国语所无,亦有三种:曰废弃语、外来语、新铸造语,施于文辞,则非善良用法。”此段译文有点拗硬,武岛实是说判定措辞妥当与否,有三个标准:一则是所用是否为当下词汇,二则是否为国民一般词汇(即不为地域、职业所限),三则词汇意义是否显著(按:原书所谓“著名”,是“反于生硬粗野”的意思)。这就涉及章氏

(下转7版) →